



清宫千余件古铜器精绘成书

省馆藏《西清古鉴》为武英殿刻本

本报记者 商越

壹 绘图著录清宫珍藏的千余件古铜器

辽宁省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《西清古鉴》，以绘图形式著录了清宫所藏的古铜器。此书是从乾隆十四年(1749年)开始，由大学士梁诗正等11人奉命编纂，历时6年完成。清乾隆二十年(1755年)，武英殿刻本刊印。

该书共40卷，附《钱录》16卷。书中著录了清内府所藏商周至唐代铜器70种共1529件。作者按照器物的外形绘图，附有文字说明，详细记录器物的尺寸、重量、图后有铭文及释义。如书中“商祖鼎”的释文：“铭只一字曰‘祖’……鼎为祭器，用于庙中，铭‘祖’宜也。”从书中所绘器物可见当时清宫的铜器藏品十分丰富。

记者看到，在《西清古鉴》卷首有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上谕一道：“……爱命尚书梁诗正、蒋溥、汪由敦率同内廷翰林，仿《博古图》遗式，精绘形模，备摹款识，为《西清古鉴》一编，以游艺之余，功寄鉴古之远思，亦足称升平雅尚云，特谕。”这段文字说明，此书是仿效北宋时期徽宗敕撰的《宣和博古图》体例编纂的。

在书的序言末尾，钤有三方玺印。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解释，起首一个圆形符号印，代表周易“乾”卦，后边为方形的“隆”和“静挹古香”印，三印组合代表乾隆的特殊身份，而“静挹古香”玺多用在书画上。在清宫中，皇帝玺印分布在各类宫廷文物上，是宫廷收藏重要的鉴别依据。

序言之后，附有纂修《西清古鉴》诸臣的职务和姓名，可知该书为梁诗正、蒋溥、汪由敦、嵇璜、裘曰修、金德瑛、观保、于敏中、董邦达、王际华、钱维城等11人编纂，陈孝泳、杨瑞莲摹篆，画院供奉梁观等绘图。

辽宁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、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介绍，这部武英殿刻本《西清古鉴》原藏于沈阳故宫西七间楼，该楼专门存放书籍墨刻。根据乾隆年间的规定，紫禁城武英殿修书处新刻的内府图书，必须要送一部或数部至盛京宫殿(今沈阳故宫)收藏。因此，至清末时，沈阳故宫西七间楼内已有书籍近500种、1100多部、1.5万多册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省除了省馆藏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《西清古鉴》外，沈阳故宫博物院还曾藏有一部清光绪十四年(1888年)日本迈宋馆铜版印本《西清古鉴》。对于这部书，民国时期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容庚曾在《清代古金书籍述评》中评：“迈宋书馆铜版《古鉴》影印甚精，然颇有修改，且有失笔，非细校是不知道的。”业内专家认为，从版本学角度来看，这两部书相比，日本迈宋馆铜版印本的文物价值要差很多。

贰 金石学研究又进一步

武英殿刻本《西清古鉴》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？佟悦介绍，在古代，绘画起到描摹形状的作用。因此，有图的书就显得非常珍贵。《西清古鉴》里著录的铜器，均深藏于清宫，都是世间稀有物；其次，选用一流的画家，图画绘制精良。另外，选用最好的刻工，雕刻的木版画也是上乘之作，更何况还有高等级的纸墨刊印。总之，在当时来看，这部书的各方面都是最高水平；第三，因武英殿刻本的主人是皇帝，所刻书籍在市场上没有流通，这些书是皇帝拿来赏赐用的，印刷量也不大，能保存至今更是非常珍贵。经过鉴定，该书收录了部分伪器，但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，推动了文人士大夫研究古铜器的风潮。

乾隆年间编修的大型丛书《四库全书》收录了《西清古鉴》，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，四库馆臣称赞《西清古鉴》考证精审，并感叹：“盖著述之中，考证为难；考证之中，图谱为难；图谱之中，唯钟鼎款识，义通乎六书，制兼乎三礼，尤难之难。读是一遍，而三代法物恍然如睹。”这段评语点明，有铭文的青铜器才是重要的收藏，对铭文的考释更见功夫。这段文字也说明，清代金石学研究人才济济。

记者查阅史料发现，我国研究古代青铜器、石刻的金石学，形成于北宋时期，当时涌现出一大批金石学家，诞生的金石著作超过百种，如金石学开创者欧阳修的《集古录跋尾》、吕大临的《考古图》、李公麟的《考古图》、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、薛尚功的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等。王昶奉敕编纂的《宣和博古图》，是第一次以皇室之力大规模著录宫廷所藏青铜器。此后元、明两朝，金石学进入低谷，到了清代得到复兴，《西清古鉴》的编纂开创了清代金石学研究的先河，带动了清代以后金石学的研究。

《西清古鉴》成书之后，乾隆皇帝又敕撰《宁寿鉴古》《西清续鉴甲编》《西清续鉴乙编》，四部书合称“西清四鉴”，收录了4000多件清宫珍藏古铜器，是官方最具规模的青铜器图鉴，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。

至于“西清”名字的由来，有学者考证为乾隆皇帝读书的南书房，而“宁寿”则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之后修建的太上皇宫殿——宁寿宫。从名字可知，“西清四鉴”相互对应，为一个整体。

叁 沈阳故宫珍藏的青铜器单独成书

提起“西清四鉴”，跟沈阳故宫还有一段渊源。佟悦告诉记者，在乾隆皇帝著录宫内所藏古代铜器时，将紫禁城收藏的800件古铜器集中编入《西清续鉴乙编》。

“沈阳故宫珍藏的这800件古铜器，是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从北京运来的，当年按编号存放在飞龙阁。”佟悦说。

《西清续鉴乙编》著录的这800件古铜器，包括商、周、汉、唐、宋历朝所制鼎、彝、盂、盘、爵、觚、钟等器物，是当年飞龙阁下层的主要藏品，存放在13座大柜中。飞龙阁的上层为清历代皇帝御用武器存放之处，如各种弓箭、鞍辔、甲冑、刀剑等军事装备4000多件。由于满族人有注重骑射的传统，清朝皇帝又以武功定天下，所以皇帝东巡盛京时，往往要亲自登楼查看先帝的这些遗物，以示珍视和敬重。这些青铜器与清帝遗物共存一阁，可以看出其象征意义和分量。

乾隆为什么这么重视古铜器呢？记者注意到，著录清宫藏品的古籍还有《石渠宝笈》和《秘殿珠林》。《石渠宝笈》成书于乾隆十年(1745年)，著录了清内府所藏历代书画作品；《秘殿珠林》成书于乾隆九年(1744年)，著录了清内府涉及佛教、道教的书画藏品。这两部书编纂的时间在《西清古鉴》前，而且从乾隆题写的鉴赏跋语和书画上不胜枚举的收藏印章上，能够看出乾隆对古代书画的雅好和热爱。

相比之下，这些古铜器藏品并没有得到乾隆皇帝过多的青睐，这体现出乾隆本人对古铜器的兴趣不大。既然没兴趣，为何还要耗费大量人力、物力编纂“西清四鉴”呢？佟悦认为，博雅好古的乾隆皇帝为了显示清宫珍藏的规模庞大、内容丰富，特意将清宫书画、铜器著录成书，并与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三部同类书——《宣和书谱》《宣和画谱》《宣和博古图》相对应。

众所周知，青铜鼎器一直被视为中华传国重器，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符号，因此“西清四鉴”的编纂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促进文化融合。



沈阳故宫藏青铜镜上贴有“奉”字标签。(沈阳故宫博物院供图)



《西清古鉴》古籍。(辽宁省图书馆供图)

周毛伯彝



《西清古鉴》内页《周毛伯彝》篇。

新视角

查青铜器下落看“奉”字标签

商越

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，清宫有800件古铜器从北京紫禁城运往盛京宫殿(今沈阳故宫)珍藏，存放在飞龙阁中。按照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的指点，记者在沈阳故宫大清门右手边找到一座二层小楼，匾额上书写“飞龙阁”3个金色大字。目前，这里正在展陈“清宫动物造型文物展”。

上世纪初，沈阳故宫珍藏的古铜器及其他珍贵文物共11.5万件，被运往北京故宫“古物陈列所”展览、收藏。1947年，“古物陈列所”并入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那么，沈阳故宫的800件青铜器，现在在哪里呢？佟悦说，在上世纪初，从沈阳调运至北京的10多万件文物中，藏于文溯阁的《四库全书》于1927年运回沈阳，其余大部分文物在抗战前夕随“古物南迁”辗转运至四川。抗战胜利后，这些文物又运回至南京。再后来，有一部分文物被运往台湾，一部分文物运回北京故宫，另有一部分仍存于南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南京的部分文物被分拨到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一些地、市博物馆。

“这800件青铜器历经多次辗转，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，但是这些文物有‘身份证’。细查之下，还是能查清其身世。”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向记者解释，这些青铜器上，有不少是带有“奉”字款的，还保存着“奉”字款标签。

为了方便记者理解，李理展示了一件沈阳故宫藏清朝制作的青铜镜，当然，这件青铜镜不属于那800件青铜器。在这件青铜镜上，贴着一张方形纸签，上有“奉第**号”字样。“奉”字指“奉天”，是上世纪初的地区标识。这些贴有“奉”字款纸签的青铜器即是从沈阳故宫迁移出去的清宫旧藏文物，只要看到文物上面这个“身份证”，就能确认它们曾经被沈阳故宫收藏。

那么这个纸签是谁贴的呢？李理说，这是上世纪初，文物从沈阳故宫调往北京，工作人员在清点核对时贴的纸签。当时清朝已经覆亡，应该是各方工作人员共同做的事情。

那么，这些在外地的青铜器现在是否还贴有“奉”字标签呢？李理说，这800件青铜器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等处都有，现在，还有不少青铜器上保留着“奉”字标签，但不容易见到了。

小讲堂

XIAO JIANGTANG

武英殿刻本

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，是清朝的“皇家出版社”。

在明代，掌管大权的司礼监下设“经厂”，为皇帝的专门刻书机构。司礼监经厂刊印的书统称为“经厂本”，皆出于专业刊印工匠之手。但因主持事务的多是宦官，所刻各书只求形式，不重内容，校勘不精，错误较多。

清代宫廷雕版印书事业继承明朝体制。清康熙十九年(1680年)始，朝廷在紫禁城武英殿设立刻书机构，直至清末。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，武英殿先后刊行书籍数百种，此即“武英殿刻本”的由来。

殿本以“钦定”“御纂”等敕撰方式产生，内容涉及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类，凝聚着清朝内廷众臣的集体智慧。其中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编刊书籍数量最多，质量亦佳。嘉庆以后各朝，随着国势日趋衰落，刻书品种逐渐减少。